

【学科视点】

我对“吕叔湘之问”的回答

——关于语文教学科学化思考与探索

陆继椿

【摘要】对“吕叔湘之问”，我用实践进行了回答。经过探索，形成了以“一课有一得，得得相联系”为特征的“分类集中分阶段进行语言训练”（简称“双分”）教学体系，并编写了一套语文实验教材。我的“双分”教材体系借鉴了叶圣陶、夏丏尊先生《国文百八课》的编写思路，是追求语文教学科学化思考的结晶。

【关键词】吕叔湘之问；“得得派”；一课一得；双分体系；教学科学化

语文教改是长期的复杂的，需要不畏艰辛，需要动力，需要坚持。

40年来，我深感，真正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让学生真正得益，扎扎实实学会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不是搬理论、翻花样、赛几堂课、写几篇论文就能奏效的。

抚今追昔，我深有感触！

—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百废待举；教育是重灾区，语文学科更是被摧残到几近取消的地步。

40年过去了，而今的中青年教师，难以想象“停课闹革命”的学校乱象，不知道所谓“复课闹革命”还需要工宣队、军宣队进课堂；更不知道用所谓政治课代替语文课，把语文课上成“语录”课的情景。

当年的我辈，亲历教育大批判，教师受批斗，眼看学校问题成堆，学生问题成堆，教学问题成堆……无能为力，只能心诽而无可奈何。

粉碎“四人帮”，普天同庆，拍手称快，语文教师如我辈，解放感特别强烈！当时，我用“新散曲”的形式，写了一系列表达狂喜心情和深沉思考的诗，其中有一首《吃蟹曲》流传甚广：

秋风劲，战地黄花香，捉蟹人欢畅。一雌三雄，同煮一锅汤，剥它红壳，还我膏黄，斩断利爪，揪出餐和尚，咬牙切齿咬其肉，恨满胸怀诉罪状：搅混水，挖长堤，张牙舞爪，横行四方，全没心肺肝肠；吐许多唾沫，假充香皂涂污垢，其实是一肚子脏水臭气满嘴放；谁敢动它一根毛，洋眼落睛伸长钳，恶狠狠，简直要你把命丧！一杯酒，一碟姜，吃它个精

光。毒草锄了能肥田，反面教员有营养，今日吃蟹曲，君莫忘！

正是这种政治上的解放，让广大语文教师内心升起拨乱反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重振语文教学中去：奋起直追，要把失去的10年补回来！我当时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要从实际出发，想尽一切办法，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教好！

邓小平同志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就像阵阵及时雨，令曾被划入“臭老九”行列的教师，备受信任，备感关怀；备受鼓舞，备感责任重大。

这些，就是那个年代把职业融入事业，把工作看成贡献的教师，能够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不求功利，一心教书育人，全力以赴扑在学生身上的动力！

1978年3月18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尖锐地指出：“十年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叫人猛醒的棒喝！

这是严肃的科学责问！

这查明了攻坚的症结，指明了语文教改的方向。

吕叔湘先生已作古多年，但我深切地悟得：这个“吕叔湘之问”，不仅今天依然存在，即使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还会存在。

二

其时，著名教育家、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教授正

好在北京开会,便与吕叔湘先生主动交换意见,一回到上海就抓语文教改。同年5月,刘校长召集中文系、教育系、一附中、二附中、附小五个单位的有关教授和教师,具体部署了语文“过关”试验的一系列讨论,最后决定由附小、一附中、二附中分别立项运作。

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刘校长已经很有远见地认为,小学初中这九年,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黄金时期,要“实现中小学语文教学一条龙,初中语文要过关”。

“文革”前,刘校长主持过华东师大编写的五年制中学语文教材,我有幸参与过讨论和试教。1963年我进华东师大中文系进修,也得到过刘校长的支持和鼓励。这次语文“过关”试验,一附中的徐正贞校长授权我全权参与,完全是在刘校长的直接指导下,我感到自己特别幸运。

我探索的“语文教学一条龙”是初中部分。当时,人力物力极有限,我只好一个人边调查学习,边设计体系,边编写教材,边进行试教,边总结经验,日日夜夜……但是,每一步都是在刘校长的悉心指导下进行。我充满信心,觉得自己很有力量,进度非常快。经过三年的努力,试验的教材教法都传播开了,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1985年,庆祝第一届教师节的时候,上海电视台还为此给我和刘校长拍了一部专题片播出。

刘校长是位教育大家,是我极尊敬的长者,他的为人、他的睿智、他的学识和见解,令我终生难忘!

此外,争取志同道合者,共同努力,积极推广,也是不断增加动力、能够坚持下去必须具有的条件。我的同事童明友、卢启之,徐正贞校长的继任者季克勤校长,还有后任我区教育局局长邢继祖同志,都把我这个“一条龙”语文“过关”试验当成共同的事业,为此不辞辛劳。

这个试验项目,我根据它的特点,定名为“分类集中分阶段进行语言训练”(简称“双分”)教学体系。三年的探索实践,教学的系列和相应的教材、教学方法,都基本成形。于是,征询各省市试点学校的意见,报请刘校长同意,由一附中出面召开了“双分”教学研讨会。这就是首届全国“双分”教学研讨会。

会后,我进一步完善了“双分”教学的体系设计,修订出“双分”实验教材交华东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后,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在暑假里召开一次全

国试点学校派代表出席的“双分”教学研讨会(1989年除外)成为惯例。一年又一年,“双分”教学试点班就像滚雪球一样,遍布全国。

就这样,明知任务艰巨,没有一分钱科研津贴,没有一整套科研条件,就凭事业感、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形成的动力、精力、合力,创造了一个语文教改的奇迹,留下了一串串探索语文教学科学化化的脚印。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撸起袖子干”。显然,语文教改就是一项非撸起袖子干不可的艰辛事,必须有坚实的铆足劲的动力。

以上是我审视语文教改的现状,有感而发的回顾,好像还有些可资借鉴的吧?

三

“双分”教学在1989年之后,由于教材修改审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尽管我在《语文学习》撰文,为“双分”教学的不同意见答疑,为“双分”教材的再次修订作了全面阐述;还向当时的市教育局报告,请求将“双分”教材融入市编语文教材,然而,教改的大环境跟80年代不同了,情况越来越复杂。终于,“双分”教材不再版,各省市的“双分”试点班也就渐渐减少。

后来,华东师大筹划出一套中小学语文教材,副校长王铁仙教授任编写组组长,聘我为副组长,负责编写初中部分。当我将“双分”教材的一些特点融入编写计划书,准备重新迈开探索语文教学科学化脚步的时候,上海市H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任务落入华东师大,王铁仙教授受命主编。我们这个成立仅几个月的校编写组,就宣布冷藏,至今都没有解冻。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顾振彪编审是我华东师大的校友。有一次,他拍拍我的肩,笑着说:“你的好东西我们都吸收了!”我有些激动,暗自庆幸“双分”还有它的价值。

这不禁又使我想起1987年教育部借调我参与编写香港《中国语文》一事。编写组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由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任主编,黄成稳编审主持日常工作。1991年,这套《中国语文》由麦克米伦(香港)公司出版,被香港教育署评为AA级教材。其中我确实倾注了“双分”教材的编写经验,因而也一直为能参与这次编写而庆幸。

更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双分”教材绝版了,但“双分”教学的影响已经很深远。“一课有一得,得得

相联系”，张志公先生笑赐的“得得派”也不胫而走。“得”作为一种教学思想，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许多教师的教学实践里。

语文教改之路走到今天，曲曲折折，虽然峰回路转，有时难免彷徨四顾，却没有望峰息心，而且一大批想有所作为的中青年教师，正在上下求索之中。

最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明确的教育任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在这个大背景下，2017年新学年开始，中小学语文教材全国统一，多年实行的“一纲多本”局面结束了。这是改革形势新阶段的大事件，每个语文教师都要做好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语文教改的探索者更需要积极反思。

1989年各个方面编就的语文教材送审之后，有的通过了，有的没通过，有的要修改。但教师使用教材仍旧是没有选择权的，自编教材的省市只用本省市的，看似有优势，也只是占教材市场的份额而已，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不见得特别有效。

四

这些年来，语文教改曲曲折折，理论、经验、观点、公开课、竞赛课，纷纷扬扬，各称其是，此起彼伏。中青年教师免不了蓬转逐新，老教师也难免添些困惑。

学生学习和掌握本国语言，在学校有限的课时中究竟需要教学哪些内容？教师面对一个班级的学生，究竟怎样运用教材上课？学生应该做哪些必要的作业？如何安排？不同层次的学生个体，课内外怎样因材施教？要讲究实效、扎扎实实地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这都是些老问题，许多语文界前辈已为之呕心沥血，“吕叔湘之问”正是为了寻求这些问题解决之法；这又是些新问题，全国使用新的统编语文教材，语文课的教学篇目确定下来了，就看现在的教师怎么教现在的学生了。

正如我的老校友顾振彪汲取“双分”教材的“好东西”一样，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实践出来的“好东西”，必然会集大成地体现在新的统编教材中。并且，基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任务，新教材在确立体系、编选课文、设

计作业中必然有许多新创意，以使教材更好地发挥正能量作用。

教材既成体系，就有循序渐进的考量，因为“序”是由学生的认识规律和学习规律决定的，要求教师在有限的课时内能实施有效的教学，当然应该清楚明确。教师按照教材既定的“序”，一课一课教下去，是普遍的通常的做法。

但如果考虑到所教班级教学实效的针对性，就应该允许教师在使用教材时有一定的自主权。叶圣陶老先生说过“教材无非是例子”，从学生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教材的“序”，更贴切地用好“例子”，应该是更符合科学的。有一个时期，香港出版了18套《中国语文》。这18套教材，每个年级的课文篇目都是香港教育署定的，不得更动，一学年都要教完。但是按什么样的“序”，一篇课文编在上学期还是下学期，编排怎样的课文顺序，组成哪几个教学单元，教师可以各有主张，各不相同，各有侧重，各有特点。这些教材编得有的要求高，有的要求低，被不同层次不同学校选用，各取所需。教学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可行的、有效的、科学的。

现在，全国中小学语文学科都用统编教材，学生课内读的课文就是共同的，积累的基础语言应该是一样的，受到人文思想的基本熏陶也应该差不多。但不同的学校、班级和学生，在教学要求上，显然还应该有多少、高低、深浅、宽窄等不同的区别。教师在有些教学阶段，依据新教材体系编就的课本，灵活地调整出一个实际教学的“序”，将课文进行相应的再组合，从而实施具体的课文教学，有时是很有必要的。上海市大同中学在使用市编语文教材时，就这样实践过，因为教学的针对性强，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这个实际教学的“序”就体现了科学化。

五

在语文教学科学化的探索中，有没有“序”，要不要“序”，有过不同的意见。1978年刘佛年校长提出的“一条龙”设想，我理解就是寻求一个语文教学的“序”，他鼓励我提炼出“得”的教学思想，用“一课有一得，得得相联系”去设计教学体系。

我通过解剖写的能力，寻求到一个能够在有限课时内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的“序”；并且按“序”选编课文，把语言积累的基础容量和人文思想的基本影响分配进一定的教学阶段，落实到每一个课时中去。这似乎很符合习近平同志说的，做事情要像一

一个一个敲钉子,要精细化。四千多个“双分”教学试点班的实践证明:这个“序”是可行的、有实效的。

教学就是要使学生学有所得,学生“得”了,就说明教学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和学习规律。语文教学教的是本国语言文字,也就是教母语。一个孩子开始说话,开始认字,就一直在学习母语。尽管小学一年级强调零起点,但不同的孩子掌握母语的程度上和运用母语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在班级授课制中,年级越高,学生的母语水平就会表现出越大的差距。

教材“序”的制订,只是面向母语的基础水平,面向社会的基本应用,面向大多数学生的可接受性。每个学生必须循“序”渐进地完成每堂语文课、每个语文学习阶段、每个学期的语文学习任务,通过九年义务教育,最终达到语文“过关”的要求。

因为是母语,生活中处处可以学习,肯定有些学生或者有天赋,或者有兴趣,或者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课内外的母语学习,超越“过关”,达到更高的语文水平,也就是发挥自主学习而多“得”了。

高中语文教学是在初中语文“过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显然要发展,要提高,要具有更“深广”的语文基础,以适应培养高层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需要。简言之,高中生学语文,应着重提高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能够在生活和阅读中提炼出自己的见解,有效地晓畅表达。

为此,编教材,论教法,还是应该寻求一个基于实效的教学的“序”。我曾打算着手试验,具体设想也发表在当年的《语文战线》上。后来,刘校长反复考虑,还是总结和巩固初中阶段的“过关”试验,至于高中阶段的“深广”试验,以后看情况再进行。可惜,刘校长后来病了,身体渐渐不支,无法再听取我的汇报,再没有支持我的“深广”试验的可能了。

六

不管高中初中,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关键,是要有“得”的教学思想。上语文课不能面面俱到、蜻蜓点水,也不能钻深钻透,必须把目标集中在学生必掌握和可接受的“一得”上,用好课文这个“例子”,落实“一得”,让每个学生都有“一得”的获得感。当然,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还可能自主“多得”,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教学实效自然可观。这跟罔顾“序”、主观教,完全是不一样的。

“得”的教学思想是站在学生学的立场上的,教材为教学服务,教学为学生服务,课文需要学生自己

读,要在琅琅书声和密咏恬吟中去领悟。教的课文无论是长是短,必须学生先自学,先对课文有总印象,有自悟,然后教师再引导学生深入探究教学之“一得”,使之必得,随之多得。于是,“一课有一得,得得相联系”就顺理成章。学生学语文,自然地顺“序”“过关”“深广”,其成绩能不斐然乎?!

语文教学的科学化,是不少讲求教学实效的语文教师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上世纪30年代的两位老前辈,叶圣陶先生和夏丏尊先生,就有志于此。他们志同道合地编写了《国文百八课》,在编辑大意中明确地说:“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并且将三年教学6册,编定108课,每学期18课;每课“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1935年和1936年共出版了四册,惜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终止了。

我的“双分”教学体系是借鉴了《国文百八课》的,从探索语文教学科学化的道路看,我是顺着两位老前辈开拓的足迹,在刘佛年、吕叔湘、张志公三位大师的指引下,跟一批志同道合者一起,在新的教育改革形势下相对比较宽松的教學环境里,共同努力创造和实践了那么多年,虽然远谈不上什么重大成果,但留下的一串串脚印是切实而清晰的。

不要担心有人会把“科学化”用绝对的“量化”来衡量,也不要担心一讲“科学化”就是突出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就会削弱“人文性”。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就是实事求是地遵循学生的认识规律和学习规律,从他们学语文的实际状况出发,去追求每个学生学习的实效,让他们不断地在思想文化和语言运用上有获得感,逐步提高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热情,培养他们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课内打基础,课外求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学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语文学科的“过关”和“深广”教学,成为学生自主发展和终身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我相信,在探索语文教学科学化的道路上,不管如何艰辛与漫长,不断会有新的人迈开新的脚步,直至回答好“吕叔湘之问”!

【作者简介】陆继椿,华东师大一附中(上海虹口区 200086)。

【原文出处】《语文教学通讯》(太原),2017.12B.8~12